

琿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始建年代 及出土造像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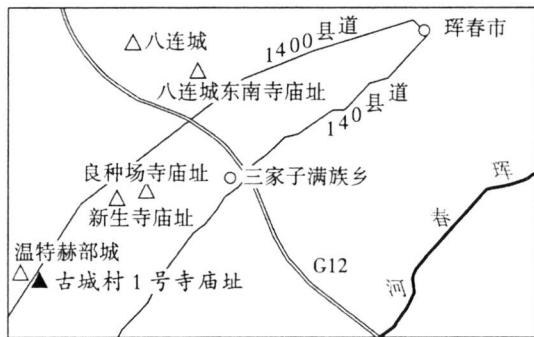
蒋璐 赵里萌 解峰

【作者简介】蒋璐,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讲师;赵里萌,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讲师;解峰,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原文出处】《文物》(京),2022.6.84~9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批准号:17VGB013)阶段性成果。

古城村1号寺庙址位于吉林省琿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东,地处琿春盆地西部图们江与琿春河交汇处的冲积平原(图一)。遗址发现于1996年,在历次考古调查中采集到佛像、瓦当、筒瓦、板瓦等遗物。调查材料于2015年发表后^[1],引起了学界关注。有学者撰文,认为该寺庙址与同处琿春盆地的杨木林子寺庙址均始建于高句丽时期^[2]。目前,我国境内仅此两处遗址被推定为高句丽时期寺庙址。本文以2015年发表的调查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对古城村1号寺庙址的始建年代、出土造像年代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求证于方家。



图一 寺庙址位置示意图

一、历史背景

研究表明,古城村1号寺庙址所处的琿春地区原为沃沮故地^[3],后逐步为高句丽征服^[4]。以往研究多

认为,高句丽在沃沮地区的统治中心“栅城”位于琿春地区,但具体地点存有争议,形成“琿春温特赫部城说”“琿春萨其城说”等多种观点^[5]。在传世文献中,多次出现关于“栅城”的记载,如《三国史记》记载98年,高句丽太祖大王“东巡栅城”,在此狩猎、赏赐守吏、刻石纪功^[6];217年,“汉平州人夏瑶以百姓一千余家来投,王纳之,安置栅城”^[7]。出土文献中亦有与“栅城”相关的记载,根据以往对洛阳出土《高质墓志》的研究,高氏先祖为追随朱蒙王的股肱之臣,十九代祖因与前燕作战有功被故国原王赐予铁券;高质(626-697年)祖父高式为高句丽莫离支,高质父高量曾任栅城都督^[8]。高式担任的莫离支一职约相当于唐代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掌管内外军国大事^[9],高量所任栅城都督应为该地区最高长官。668年,唐联合新罗灭高句丽,文献中没有栅城地区发生大规模战争的记载。698年,原居于营州的粟末靺鞨在牡丹江上游流域建立政权,首领大祚荣自称“震国王”。713年,大祚荣被唐玄宗册封为“渤海郡王”,始以“渤海”为号。渤海国曾多次迁都,其中,785-794年,渤海国都城为东京八连城,位于古城村1号寺庙址东北约4公里。926年,渤海国为契丹攻灭。

综上,虽然在文献及考古发现中未发现高句丽人向琿春地区大规模移民的线索,但可能在公元1世纪,该地区已经成为高句丽东部重要据点,其后利用

汉地移民进行了充实、开发。并且,至少在高句丽晚期,栅城的最高长官以王室信任的贵胄充任。由此可知,古城村1号寺庙址所处的琿春地区在被高句丽征服之后,随着开发逐渐加强,重要性日益提高,逐步成为政治、经济要地,并且在渤海国时期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古城村1号寺庙址中采集的遗物包括瓦当、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以及佛像残片。一般认为建筑构件,特别是瓦当的年代可作为推定建筑年代的重要依据。该寺庙址出土了网格纹瓦当、莲纹瓦当。其中,网格纹瓦当当面发现模印铭文,由于瓦当残坏,仅存“年六月乍(作)”四字,根据当面纹饰、文字布局推测,原应有六字,“年”前二字可能为干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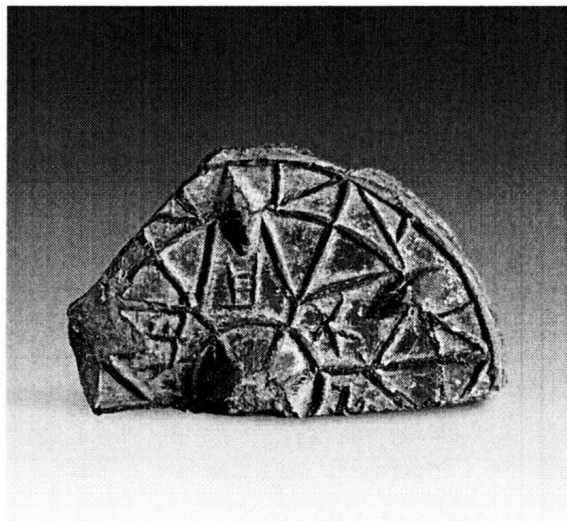
宋玉彬以瓦当的年代学研究为基础,对该寺庙址始建年代进行了讨论,认为寺庙址出土的网格纹瓦当当面纹饰(图二)^[10]与辽宁北票金岭寺等地点出土的三燕时期(337-436年)瓦当(图三)相似^[11],当面带有干支纪年这一因素则源自高句丽卷云纹瓦当,反映出其融合了前燕、高句丽双重因素,“应该不会晚于施一般铭文或无铭文的卷云纹瓦当”,即其制作年代不晚于391年。结合对历史文献的梳理,推测前燕灭亡后,前燕工匠随着僧侣进入图们江流域营建了古城村1号寺庙址,该事件发生于“高句丽政权以国内城为都之时”^[12]。田立坤通过对历史文献进行分析,认为前燕时期夫余人曾被虏至辽西地区,前燕灭亡(370年)和淝水之战(383年)为这部分夫余人返回故土创造了契机,他们来到图们江流域,建造了古城村1号寺庙址^[13]。

据《旧唐书》记载,高句丽“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14],说明瓦类建筑构件只用在佛寺、王宫等高等级建筑上。文献中将“佛寺”列于“神庙”“王宫”“官府”之前,或许暗示着佛寺的重要性较后者还略有胜出。由此推测,高句丽佛寺的营建可能与高句丽政权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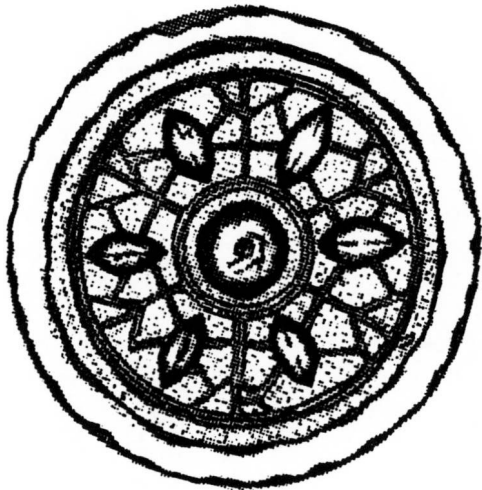
一般认为,佛教传入高句丽的时间为十六国时期,前秦、三燕佛教均对高句丽佛教产生了较大影响^[15]。文献中关于佛教通过官方渠道传入高句丽最早、最明确的记载见于《三国史记》,该书称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年),前秦“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

像、经文”至高句丽^[16]。该书还记载了佛教在高句丽最初的发展情况:小兽林王五年(375年),“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17],推测“肖门寺”“伊弗兰寺”应位于当时的高句丽都城——吉林集安国内城,此事件表明高句丽开始在国家支持下建立佛教寺院;故国壤王九年(392年)三月“下教,崇信佛法求福”^[18];广开土王二年(393年)“创九寺于平壤”^[19]。

文献记载表明,高句丽兴建佛寺始于375年国内城设置肖门寺、伊弗兰寺。推测兴建佛寺过程中,应有一大批僧侣得到培养,为佛教在高句丽的传播打下基础。故国壤王“下教崇信佛法求福”与广开土王创立平壤九寺,应与此时期佛教僧侣的数量增加、水



图二 古城村1号寺庙址瓦当



图三 辽宁北票金岭寺瓦当

平提高有直接关联。平壤九寺的创立,标志着佛教在高句丽政权的支持、管控之下开始由都城地区向全国范围扩展。可以说375—393年的十余年,是佛教在高句丽官方支持下逐渐兴盛的阶段,政权的支持、寺院的增加、僧侣的涌现成为佛教能在高句丽都城以外的地区得以推广的基础与动因。

通过前文关于高句丽建筑等级、佛教发展过程两方面的分析,在明确古城村1号寺庙址为高句丽时期遗存的基础上,或许可对其始建情况作出进一步推测:该佛寺是在392年故国壤王“下教崇信佛法求福”后,在佛教由都城地区向其他地区扩展过程中,由高句丽官方主导、三燕工匠参与修建的,始建年代应晚于平壤九寺的建立或与之同时,即其始建年代不早于393年。

关于古城村1号寺庙址始建年代的下限,根据已发现的考古学材料难下明确结论。一方面,学界对辽宁发现的网格纹瓦当的具体制作年代存有争议,形成了前燕^[20]、后燕^[21]两种观点,无法为古城村1号寺庙址网格纹瓦当提供更为精确的参考;另一方面,文化因素在传播过程中,途径、路线会受到各种影响,早期因素可能出现于晚期遗物上。若将瓦当上的纪年铭文视为高句丽文化因素、网格纹视为三燕文化因素,不能排除这两种文化因素出现在年代更晚的瓦当上的可能。因此,要进一步明确古城村1号寺庙址始建年代,除了加深对瓦当制作年代的认识之外,还需要综合更多方面的线索,并期待新的考古发现及相关研究的开展。

三、造像题材与年代

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造像包括砂岩质造像残片、陶质造像残片、小型石灰岩质造像残片。砂岩质造像残片共2件,其中1件为背屏残片;另1件仅保存台座,台座上有双足,据残片推测可能也是背屏式造像。此2件残片破损严重,无法推定年代。陶质造像头部残片1件,造像面部端正,颈部粗壮,戴宝冠,形式接近北朝晚期至隋代菩萨像或天王像。出土数量最多的小型石灰岩质佛造像,保留了较多年代信息,是本文主要讨论对象。由于该类造像亦破损严重,无法进行类型学划分,以下根据残片呈现的题材进行分析,明确造像组合。

1. 单身佛坐像与二佛并坐像

小型石造像中,造像主题明确的包括单身佛坐像1件(96HSG I:1)(图四)^[22],二佛并坐像1件(96HSG I:2)(图五)^[23]。其中二佛并坐像双尊结跏趺坐,长方形台座下雕有棒头,袈裟为上衣搭肘式,下摆形成宽大的悬裳座。与汉地佛造像中二佛并坐像不同的



图四 古城村1号寺庙址单身禅定佛坐像(96HSG I:1)



图五 古城村1号寺庙址二佛并坐像(96HSG I: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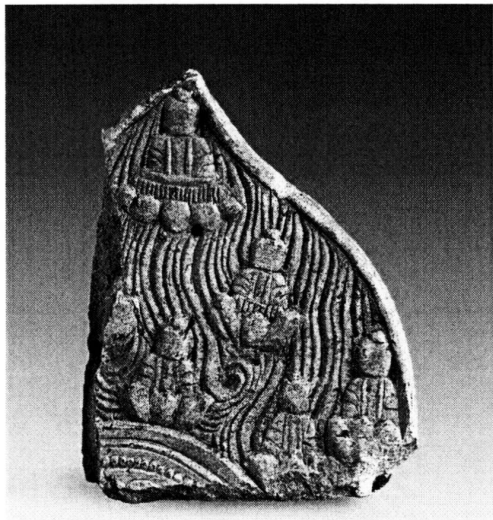
是,该造像双尊手印均为双手抚膝,左尊头光叠压右尊头光,僧祇支形式分别为对衽、左衽交领。具备上述特征的二佛并坐像,此前仅在距古城村1号寺庙址约15公里的新生寺庙址发现过(图六)^[24]。新生寺庙址二佛并坐像双尊背屏上方分为左右对称的两个瓣尖,左右两侧顶端外缘略呈外凸状弧形、内缘呈内凹状弧形,化生童子以造像中心为轴左右对称分布,而非沿某一瓣尖的中轴左右对称。

古城村造像中的3件残片上亦可以见到类似的特点:96HSGI:5背光上部残片,残存头光上缘,其上方及左右各见一身莲花化生,三身化生环绕头光,未沿背光顶部中轴线对称分布(图七)^[25];97HSGI:6背光上部残片,残存头光上缘,正面可见五身化佛,化佛未沿背光顶部中轴线对称分布,背光外缘左侧线条内凹、右侧线条外凸,左右亦不对称(图八)^[26];97HSGI:3背光上部残片,中部存两个主尊的头光,头光为素面同心圆环状,左尊头光叠压右尊头光,头光外侧为两重素面圆环,内侧为圆盘状,上施彩绘,背光右

侧边缘可见胁侍桃形头光,头光上方可见两身莲花化生,背光顶端外缘左侧线条内凹、右侧线条外凸,左右不对称(图九)^[27]。推测这3件标本的原貌可能与



图七 古城村1号寺庙址双身像残片(96HSG I:5)



图八 古城村1号寺庙址双身像残片(97HSG I:6)



图六 新生寺庙址二佛并坐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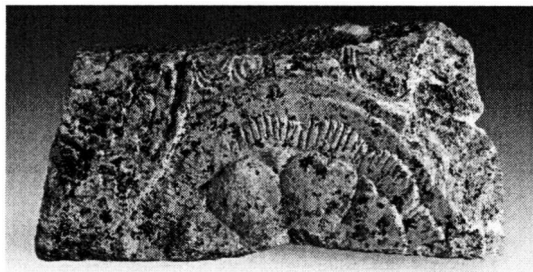


图九 古城村1号寺庙址双身像残片(97HSG I: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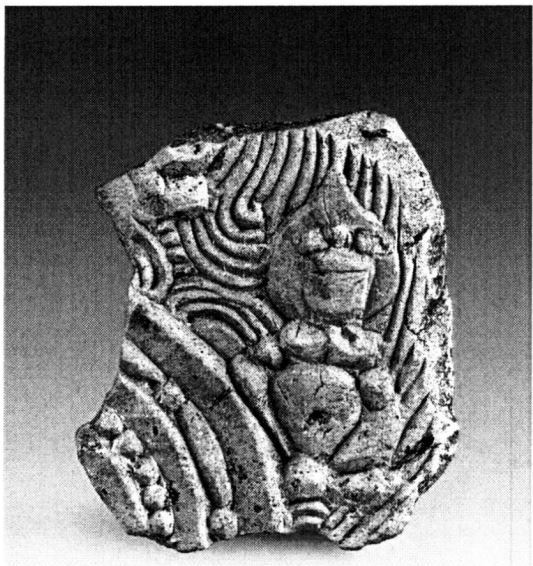
新生寺庙址二佛并坐像接近,也属二佛并坐像。此外,97HSG I:7残存两个头光,呈叠压状,头光外侧为两重素面同心圆环,中心为多重莲瓣构成的莲花纹(图一〇)^[28],头光叠压及莲瓣形态两方面特征与前述古城村96HSGI:2、新生寺庙址二佛并坐像相同,应系主尊而非胁侍的头光,推测该造像也是二佛并坐像。上述4件残片及96HSGI:2在头光构图方式、头光莲纹形式及背屏装饰纹样等方面各不相同,应分属5个不同个体。

2. 胁侍菩萨像

菩萨头部、身躯残片共发现8件。根据残片边缘确认,其中6件处在造像的一侧,应为主尊胁侍像;另2件仅存头部及头光,参考本地区出土的同类造像,结合其体量较小这一特征,推测此2件菩萨像残片为胁侍而非主尊的可能性较大。遗址中还出土佛头残件3件,应系造像主尊。上述11件残片难以推断造像主题。



图一〇 古城村1号寺庙址双身像残片(97HSGI:7)



图一一 古城村1号寺庙址化生菩萨像残片(96HSG I:11)

背屏残片上的雕刻主要为火焰纹、莲花化生、千佛三种。其中莲花化生可分三类,第一类为化佛;第二类为化生童子;第三类96HSGI:11较为特殊,化生头部有三个圆形发髻(图一一)^[29],其身份应有别于化佛、化生童子。在北朝晚期汉地菩萨造像中,常见菩萨头部有三个圆形发髻的现象,如美国芝加哥博物馆藏西魏大统五年(539年)康生造金铜菩萨像(图一二)^[30],推测96HSGI:11化生头部的三个圆形物可能是对菩萨头部发髻的简化形式,故暂将此形象称为“化生菩萨”。

3. 比较研究

古城村1号寺庙址所处的图们江流域(包括临近的俄罗斯滨海地区楚卡诺夫卡河流域)共有7个地点出土此类小型石造像,包括龙井仲坪寺庙址、珲春新生寺庙址、八连城东南寺庙址、古城村1号寺庙址、杨木林子寺庙址、五一寺庙址、克拉斯基诺寺庙址。造像形式、雕刻风格统一,可能属于同一造像系统^[31]。古城村1号寺庙址材料发表之前,学界曾讨论了新生寺庙址出土造像的制作年代,形成以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等为代表的“高句丽时期”^[32]说及以日本学者驹井和爱等为代表的“渤海国时期”说^[33]两种观点,分歧至今尚存。由于高句丽、渤海国时期佛造像发现数量较少,且多数缺乏层位依据,造像发展序列尚未建立,无法将古城村1号寺庙址小型石造像置于某一序列中,故下文对造像年代的推定方式,是通过分析



图一二 西魏大统元年康生造菩萨像(局部)

造像本身的形式、样式特征,加以与周边地区造像进行对比研究,从造像佛衣、手印、背屏、莲花化生形式及造像组合五方面推定。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古城村造像残破较甚,因此在讨论背屏样式、造像组合两个因素时,将参考新生寺庙址出土的同类造像。

(1)佛衣

古城村1号寺庙址造像中,二佛并坐像96HSGI:2双尊均着上衣搭肘式袈裟,右尊内着对衽僧祇支,左尊着左衽僧祇支。根据以往的研究,上衣搭肘式佛衣在北朝造像中主要流行于北魏时期^[34]。该造像左尊所着左衽交领僧祇支在汉地造像中较早的例证可见于北魏时期关中地区造像碑,如陕西省华县瓜坡出土的北魏朱黑奴造像碑左侧第三层龕二佛并坐像(图一三)^[35]。石窟寺造像中,笔者仅发现甘肃庆阳北石窟寺第224龕隋代禅定佛坐像一例(图一四)^[36]。此种僧祇支多见于已发现的高句丽造像、百济造像,如朝鲜黄海北道出土高句丽金铜佛坐像(图一五)^[37]、韩国普愿寺出土百济金铜佛立像(图一六)^[38]、韩国泰安百济摩崖三尊像(图一七)^[39]等。除了96HSGI:2之外,古城村96HSGI:4(图一八)^[40]上的千佛也使用左衽僧祇支,反映出本地区造像流行此种佛衣。关于高句丽、百济造像为何大量使用左衽僧祇支,费泳认为汉地造像在传入高句丽、百济后,佛衣经历了“本土

化改造”的过程,左衽交领内衣即在此过程中出现^[41];也有观点认为左衽僧祇支并非高句丽、百济造



图一四 甘肃庆阳北石窟寺第224龕隋代佛坐像



图一三 北魏朱黑奴造像碑二佛并坐像



图一五 朝鲜黄海北道出土高句丽金铜佛坐像

像的“本土化产物”，而是在不违反造像仪轨的前提下，从汉地佛衣形式中选择了接近本地区传统服饰的左衽形式^[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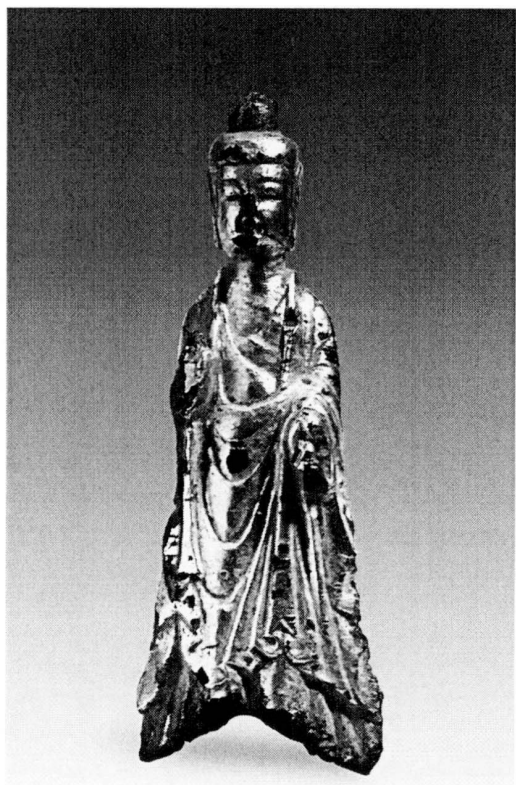
(2)手印

二佛并坐像96HSGI:2双尊均双手抚膝，新生寺庙址中出土二佛并坐像均与之相同。在十六国至隋唐汉地石窟寺造像、背屏式造像、造像碑上，结跏趺坐并结此种印相的二佛并坐像仅见于河南博物院藏隋开皇元年(581年)道俗五百人造像柱右侧上部下层龕(图一九)^[43]，该龕二佛均双手抚膝，与古城村1号寺

庙址、新生寺庙址发现的二佛并坐像较为接近。

(3)莲花化生

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造像上的莲花化生形象，可分为化佛、化生童子、化生菩萨三类。其中，化佛头部有明显肉髻，化生童子头部有对称的双髻。莲台为仰莲形式，减地雕刻，化生凸起于背屏表面，形式接近北朝晚期汉地金铜造像的背屏做法，如山东诸城市博物馆藏东魏金铜菩萨立像(下页图二〇)^[44]。另外，古城村96HSGI:10(下页图二一)^[45]的莲花化生形式亦较特殊，为同一莲台上并坐两身化佛，此种图像不见于已发表的汉地造像，佛教经典中亦无可与之相应的内容。笔者推测这种二佛并坐莲花化生可能与该系统造像流行二佛并坐像有关。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在集安长川1号高句丽墓葬壁画^[46]上发现一座莲台上有两身化生童子的图像(下页图二二)^[47]。



图一六 韩国普愿寺出土金铜佛立像



图一七 韩国泰安摩崖三尊像



图一八 古城村1号寺庙址背屏残片(96HSGI:4)



图一九 隋开皇元年道俗五百人造像柱二佛并坐像

虽然前者为化佛,后者为化生童子,内涵差异巨大,但二者构图形式上可能有所关联^[48]。故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古城村 96HSGI:10 出现一座莲台两身化生的图像可能与高句丽佛教美术传统有关。

(4) 背屏样式

古城村 1 号寺庙址小型石造像中有 4 件背屏残片呈现出与新生寺庙址出土的二佛并坐像相似的特

征,其背屏可能也呈现与后者相同的顶端一分为二的形式。类似形式在十六国至唐代背屏式二佛并坐像中较少。汉地造像中与之接近的实例为日本私人藏白石二佛并坐像(图二三)^[49],该造像形式应属定州系白石佛造像系统,制作年代约在北魏正光年间(520-525年)。



图二〇 东魏金铜菩萨立像



图二一 古城村 1 号寺庙址化佛像残片(96HSGI:10)



图二二 集安长川 1 号高句丽墓葬壁画化生童子



图二三 北魏正光年间白石二佛并坐像

(5)造像组合

据前述造像形式对比可知,古城村1号寺庙址小型石造像与北魏晚期以来河北地区石造像、山东地区金铜造像存在较大关联。结合古城村造像个体较小的特征,推测其与定州系白石佛造像关系可能更为密切。

4.造像年代

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主尊可辨的小型石造像包括1件单身佛坐像、5件二佛并坐像(其中4件为笔者前文推测),新生寺庙址出土主尊可辨造像包括1件半跏趺坐菩萨像(图二四)^[50]、17件二佛并坐像、1件单身佛立像、3件单身佛坐像^[51]。总体呈现二佛并坐像、单身佛坐像、单身佛立像、半跏趺坐菩萨像构成的组合。定州系白石佛造像中,东魏、北齐、隋代造像组合恰包含上述类型,北魏、唐代造像则不包含这一组合^[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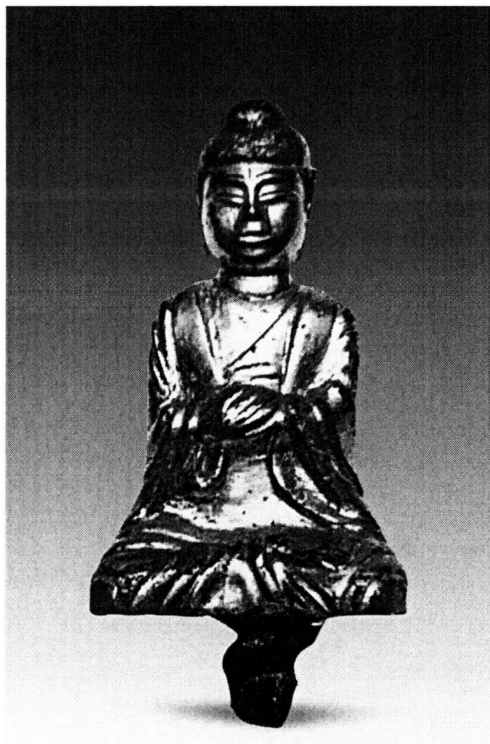
上文对古城村1号寺庙址(包括新生寺庙址)小型石造像与其他地区造像的形式对比结果表明,此类小型石造像与6~7世纪汉地造像、高句丽及百济造像在造型、组合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性,其中莲花化生、背屏、造像组合三方面特征不见于渤海上京出土造像,二佛并坐像佛衣、手印特征与渤海上京造像,如上京出土陶佛坐像(图二五)^[53]、金铜佛坐像(图二六)^[54]所代表的渤海佛像流行样式也有较大差异。

据温玉成考证,十六国时期著名僧人佛图澄的大弟子僧朗曾接受七国赠送的金铜佛像,其中包括“高丽像”“相国像”,“高丽”即高句丽,“相国”为“高句丽相之国”,后者地处高句丽发祥地的辽宁省新宾县,此次赠送佛像的时间约为400年^[55],说明与佛教推广的同时,高句丽开始自行制作佛像。将制作好的佛像作为礼物赠送给汉地僧侣,可见其在制作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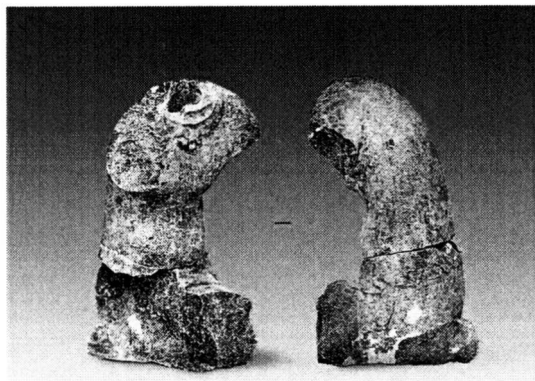
术上已达相当水平。通过与汉地佛造像进行比较,以往研究已一定程度揭示出高句丽造像演变的大致



图二五 渤海上京城出土陶佛坐像



图二六 渤海上京城出土金铜佛坐像



图二四 新生寺庙址半跏趺坐菩萨像

规律。韩国学者姜友邦曾提出高句丽造像与“中国北魏、东魏、北齐、隋等时期盛行的样式同时发展”的观点^[56]。李裕群通过考古学方式,以纪年造像为标尺,结合中原地区石窟造像发展变化规律,认为高句丽造像“是随着(北朝)都城地区石窟造像的发展演变而变化的”,并将高句丽佛造像分为三期,其中第一期为5世纪前期,第二期为6世纪初至中期,第三期为6世纪中期以后^[57]。

综上,将造像形式分析与本文前两节的讨论结果结合,推测这批造像制作年代为6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可能性较大。但考虑到图们江流域造像的形式演变可能较汉地造像存在一定滞后,故不排除其制作年代略晚——即制作于高句丽灭亡至渤海国建国之间(668-698年)或渤海国早期的可能。由造像年代推知,古城村1号寺庙址的使用年代至少延续至6世纪末至7世纪初。

四、余论

以往历史地理学研究认为珲春所处的延边地区先后为高句丽、渤海国疆域。考古学研究则对该地区是否存在高句丽遗存形成不同认识,争论的焦点在于该地区发现的各类施纹板瓦的制作年代。从板瓦凸面所见纹样看,该地区的施纹板瓦与高句丽板瓦(以集安、平壤地区出土板瓦为代表)、渤海国早期板瓦(以敦化六顶山渤海墓葬封土出土板瓦为代表)均有一定相似性。但根据已发现的材料,尚无法通过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方式进行区分。针对延边地区此种遗物的制作年代形成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制作于高句丽时期,第二种观点认为制作于渤海国时期,第三种观点认为制作年代包括高句丽、渤海国早期^[58]。

前述宋玉彬的研究中,采取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对网格纹瓦当进行了年代学分析,在此基础上将古城村1号寺庙址、杨木林子寺庙址始建年代推定为高句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两处寺庙址中均发现了施纹板瓦,不排除其与共出的高句丽时期瓦当同时期制作的可能。结合寺庙址造像年代,笔者倾向认为图们江流域发现的施纹板瓦中可能包括高句丽时期、渤海国早期两个时期的遗存。综上,加强对各类施纹瓦件的研究并解决其年代序列、组合特征等

问题,是当前研究中区分延边地区高句丽时期与渤海国早期遗存的关键点之一。

以往研究中,部分学者将图们江流域的小型石造像视为制作于渤海国时期的造像,鉴于此类造像与高句丽造像在形式上具有某些相同特征,认定渤海国佛造像“继承”了高句丽佛造像^[59]。但据上文的对比分析,此类造像很可能制作于6世纪末至7世纪初,属于高句丽时期。而以渤海上京出土造像为代表的渤海国时期佛造像整体上呈现出唐代造像特点,与高句丽佛造像风格迥异。

高句丽、渤海国遗存分布于中国、朝鲜、韩国及俄罗斯境内,相关研究已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性课题。对古城村1号寺庙址及明确包含高句丽、渤海国两期遗存的杨木林子寺庙址^[60]、朝鲜梧梅里寺庙址^[61]等遗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是佛教历史、佛教物质文化本身的研究,也是探讨高句丽、渤海国文化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参考文献:

- [1]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吉林珲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遗物整理简报》,《文物》2015年第11期。
- [2]宋玉彬《试论佛教传入图们江流域的初始时间》,《文物》2015年第11期。
- [3]据以往的历史学、考古学研究,珲春地区属于沃沮故地,与其相关的考古学遗存分布于我国东北、朝鲜半岛北部及俄罗斯滨海地区,我国考古学界称之为团结文化,俄罗斯考古学界称之为克洛乌诺夫卡文化。见林沅《论团结文化》,《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
- [4]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东明(又称“朱蒙”“邹牟”)圣王十年(前28年)“伐北沃沮,灭之,以其地为城邑”;太祖大王四年(56年)“伐东沃沮,取其土地为城邑”。见(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第176、19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 [5]刘子敏《高句丽疆域沿革考辨》,《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
- [6](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第19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 [7]同[6],第205页。
- [8]赵振华、[韩]闵庚三《唐高质、高慈父子墓志研究》,《东北史地》2009年第2期。
- [9]耿铁华《中国高句丽史》,第35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 [10]同[2],第45页。
- [11]辛岩等《辽宁北票金岭寺魏晋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辽宁考古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0年;万雄飞、白宝玉

《朝阳老城北大街出土的3~6世纪莲花瓦当初探》,《东北亚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2010年。

[12]同[2]。

[13]田立坤《吉林珲春发现的燕系瓦当之背景》,《学问》2016年第6期。

[14]《旧唐书》,第5320页,中华书局,1975年。

[15]董高《三燕佛教略考》,《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1期;刘建华《义县万佛堂石窟》,第130~135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16]同[6],第221页。

[17]同[6],第221页。

[18]同[6],第223页。

[19]同[6],第223页。

[20]田立坤《金岭寺建筑址为“庖庙”说》,《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21]王飞峰《三燕瓦当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22]同[1]。

[23]同[1]。

[24]笔者摄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25]同[1]。

[26]同[1]。

[27]同[1]。

[28]同[1]。

[29]同[1]。

[30]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第26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

[31]解峰《图们江流域小型石佛造像的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3期。

[32]三上次男认为新生寺庙址出土造像形式接近北朝晚期汉地造像,因而将造像年代推定为高句丽时期。见[日]三上次男《八连城出土的二佛并座像及其历史意义——高句丽与渤海的关系》,《渤海史译文集》,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986年。

[33]驹井和爱认为包括新生寺庙址在内的八连城外三处寺庙址与八连城遗址年代相同,均为渤海遗存,并将出土造像视为渤海国遗物。见[日]驹井和爱《渤海の仏像》,《中国都城·渤海研究》,雄山阁,1977年。

[34]陈悦新《5~8世纪汉地佛像着衣法式》,第33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35]笔者摄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36]甘肃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第441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

[37][韩]文明大《韩国佛教美术大典(1)》,第46页,韩国色彩文化社,1994年。

[38]同[37],第24页。

[39][韩]文明大《韩国雕刻史》,第100页,悦话堂,1990年。

[40]同[1]。

[41]费泳《中国佛教艺术中的佛衣样式研究》,第352~356页,中华书局,2012年。

[42]同[31]。

[43]河南博物院《河南佛教石刻造像》,第380页,大象出版社,2009年。

[44]照片由李静杰教授提供,谨致谢忱。

[45]同[1]。

[46]温玉成《集安长川一号高句丽墓佛教壁画研究》,《北方文物》2001年第2期。根据温玉成考证,该墓葬的年代为400~430年。

[47]徐光翼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8》,第160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48]另外,在余杭小横山M7出土的画像砖上也有类似的莲花化生形象,可见一仰莲台上两身化生童子,但是这一莲花化生形象与高句丽壁画及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造像的关系尚难推断。见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余杭小横山东晋南北朝墓》,第54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

[49]史岩编《中国雕塑史图录(第三卷)》,第729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50][日]斋藤优《半拉城と他の史蹟》,图版第一四,半拉城刊行会,1978年。

[51]新生寺庙址二佛并坐像数量依三上次男统计结果,见[日]三上次男《八连城出土的二佛并座像及其历史意义——高句丽与渤海的关系》,《渤海史译文集》,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986年。单身佛立像、禅定佛坐像、半跏趺坐菩萨像数量系笔者根据斋藤优发掘报告统计,见[日]斋藤优《半拉城と他の史蹟》,半拉城刊行会,1978年。

[52]李静杰、田军《定州系白石佛像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3期。详见该文表一“定州系白石纪年佛像像式与时期数量关系表”。

[53][日]东亚考古学会《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址の发掘调查(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五册)》,第71页,东亚考古学会编辑发行,1939年。

[54]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曲华风——渤海上京城文物精华》,第304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55]温玉成《集安长川一号高句丽墓佛教壁画研究》,《北方文物》2001年第2期。

[56]陈明华《韩国佛教美术》,第8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57]李裕群《高句丽佛教造像考——兼论北朝佛教造像样式对高句丽的影响》,《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科学出版社,2006年。

[58]延边博物馆《延边文物简编》,第56页,延边人民出版社,1988年。

[59]此种观点广泛流行于韩国学界,如[韩]崔圣银《渤海佛教雕刻의 새로운 考察——中国,日本古代雕刻과의 比较를 중심으로》,《高句丽研究(26)》,学研文化社,2007年。

[60]杨木林子寺庙址出土“倒心形”莲纹瓦当,吉林省博物院藏品(藏品号:1630)。根据宋玉彬的研究,此种莲纹形成于渤海文王大钦茂在位时期(737~793年),之后在渤海国流行,见宋玉彬《渤海瓦当研究》,第153页,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61]该佛寺遗址包含高句丽、渤海两期建筑遗存。见[韩]梁银景《北韓의 불교사원지 출토 고구려,渤海佛像의 출토지 문제와 계승 관계》,《高句丽渤海研究(31)》,学研文化社,2008年。